

# 王固維詩詞全編校注

陳永正 校注 ■



中山大學出版社

## 見平川夜闌算之

適然老松魁梧數百年斧斤所敵今參天風鳴媧皇王  
十絃洗耳不須苦薛泉嘉二三子甚好賢力貪買酒醉  
此筵夜雨鳴廊到曉懸相看不歸卧僧檀泉枯石燥復  
瀟瀟山川光輝為我妍野僧早飢不能更曉見寒谷百

陈永正 校注

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

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广州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/陈永正校注. —广州:中山大学出版社,  
2000.3

ISBN 7-306-01605-9

I . 王… II . 陈… III . ①古典诗歌 - 作品集 - 中国 - 近代  
②词(文学) - 作品集 - 中国 - 近代 IV . I222.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(CIP)数据核字(99)第 67181 号

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:510275)

电话:020-84111998、84037215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省番禺市市桥印刷厂印刷

(地址:广东番禺市市桥环城西路 201 号 邮编:511400 电话:020-84881937)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.75 印张 398 千字

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 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## 前　　言

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是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。他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，也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。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是近代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论著，作者并特意用自己的艺术思想去指导创作实践，他的诗词无论在题材或风格上都颇具特色。王国维不失为清末民初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。

### 一

王国维，初名国桢，字静安，一字伯隅，初号礼堂，又号永观，晚号观堂。浙江海宁人。生于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（1877年12月3日）。静安先生出身于一个“世为农商”<sup>[1]</sup>的家庭，其父乃誉能诗古文辞，攻书画篆刻，中年后里居不出，以课子自娱。静安十岁时，“诗文时艺早已洛洛成诵”<sup>[2]</sup>。十五岁中秀才后，应乡试不中，时中日之战后，变法议起，得读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疏论，遂放弃举业，改习西学。光绪二十四年戊戌（1898）初，从海宁赴上海，在梁启超任主编的《时务报》当书记校对，为馆主汪康年司笔札，并师事康门弟子欧榘甲，欧“示以传孔教、重民权、改制度”之说。<sup>[3]</sup>是年六月，以业余时间到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及理化知识。这期间，接受了“新学”和西学的影响，而对古典诗词仍是情有独钟。一日，罗振玉偶在同舍学生扇头看到静安的咏史诗，大为激赏，并为赡养其家，使无内顾之忧。静安感激知遇，事罗以师礼，自此结成终

生依托的关系。戊戌政变后，《时务报》被迫停办，罗氏留静安在东文学社任庶务，继续学习哲学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英语，直至庚子事变后东文学社解散。二十七年初，赴日本东京物理学读书，数月后，即因病辍学返国。静安结束了在学校的求学阶段，“自是以后，遂为独学之时代”<sup>[4]</sup>，对西方哲学、文学发生兴趣，专意阅读和研究康德、叔本华、尼采等人的哲学和美学著作，并从事哲学、教育学、伦理学、心理学等方面论著的译述工作。

光绪二十九年，静安受聘于南通师范学堂，任伦理学和国文教员。三十年秋，罗振玉创设江苏师范学堂，邀静安赴苏州参加筹办工作，讲授修身、文学、历史等课程。开始致力于学术研究。几年间，在罗氏主持的《教育世界》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，介绍西方哲学思想，阐述个人在教育、美学、文学等方面的见解。这时期的重要著作有《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》、《红楼梦评论》等。三十一年，《静安文集》初版刊行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罗振玉为学部尚书荣庆奏调入为学部参事，静安又相随入京，暂寓罗氏家中，专力治宋词元曲。次年春，由罗氏举荐，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，以后又任学部图书馆编译、名词馆协修等职，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。在北京期间，写成了《曲录》、《戏曲考源》、《宋大曲考》等数种整理与研究古代戏曲的著作，在这个基础上，于1912年流亡日本时完成了《宋元戏曲考》这一巨著。著名的词学著作《人间词话》，亦于光绪三十三四年间分期连载于《国粹学报》。

在诗词创作上，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这五年间，静安写下他一生中最主要和最有价值的作品，即收入《静安诗稿》中的大部分诗作和《人间词·甲稿》、《人间词·乙稿》。

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静安于当年12月携眷随罗振玉东渡，寓居日本京都。“尽弃前学，专治经史”<sup>[5]</sup>。从事中国古代

史料、古器物、古文字学的考订工作，并常与日本学者交流。1916年春，应犹太富商哈同之聘回国到上海编辑《学术丛编》杂志，继续从事甲骨文及考古学的研究。1918年，兼任哈同办的“仓圣明智大学”教授，后又应清室遗老沈曾植之邀，参加纂修《浙江通志》。在日本京都的五年和在上海的六年，是静安学术活动最盛的时期，写下大量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著，1922年，编成《观堂集林》二十卷刊行。同年受聘为北京大学通讯导师。

1923年春，由蒙古贵族升允推荐，召为清故宫“南书房行走”，5月入北京就职，食五品俸。1924年11月，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，静安认为是奇耻大辱，几次要投御河自杀，因家人严密监视而未果。次年，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，讲授经史、小学，并从事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。1927年6月，当北伐军向北节节推退之时，静安写就遗书，谓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”<sup>[6]</sup> 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。终年50岁。

## 二

王国维的诗歌创作，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。第一期为问学江乡时期（1899—1905）。第二期为访学日本时期（1911—1915）。第三期为治学上海时期（1916—1923）。第四期为讲学北京时期（1923—1927）。

第一期包括静安在上海东文学社学习和在南通、苏州两地师范学校任教时期。主要作品有收入《静安诗稿》的古今体诗49首，加上早年所作《咏史》20首，以及后来的弃稿《戏效季英作口号诗》6首，共75首，约占静安诗总数的五分之二。

静安问学江乡时期，如饥似渴地研读西方哲学书籍。如他所说的：“体素羸弱，性复忧郁，人生之问题，日往复于吾前，自

是始决从事于哲学。”<sup>[7]</sup>这期间的诗作，几可视为静安哲学思想的样板。作于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的《题梅花画笔》一诗，已为这一期的创作定下了基调：

梦中恐怖诸天堕，眼底尘埃百斛强。苦忆罗浮山下住，  
万梅花里一胡床。

“梦”，人生是一场幻梦，梦中充满恐怖，充满痛苦。世界是虚妄的，无法预知的。静安一再感叹道：“人生一大梦，未审觉何时？”（《来日二首》之二）中国古代诗人也常叹息“人生如梦”，这梦也有悲哀也有欢乐，而静安的“梦”是叔本华所说的“人生是一大梦”的无穷无尽的痛苦之梦。“梦”，是虚幻的：“早知世界由心造，无奈悲欢触绪来。”（《题友人三十小像》）“我欲乘龙问羲叔，两般谁幻又谁真？”（《出门》）梦与现实，真幻难辨。“面墙见人影，真面固难知。”（《来日二首》之二）尽管无法了解人生的真面目，却不得不面对这眼底污浊的“尘世”：“朝朝吴市踏红尘”（《九日游留园》）、“不堪宵梦续尘劳”（《尘劳》）。生活在尘世中，总是感到局促难伸：“人生苦局促，俯仰多悲悸。”（《游通州湖心亭》）“侧身天地苦拘挛”（《杂感》）个人无法得到自由，如鱼在罟，如鸟在笼：“网罟一朝作，鱼鸟失宁居。”（《偶成》）、“野鸟困樊笼”（《游通州湖心亭》）。“荆棘窘余步”（《来日二首》之一），终日营营役役，不遑宁处。诗人感到生活实在没有意义，他迷惘、怀疑、痛苦，发出了绝大的疑问：

来日滔滔来，去日滔滔去。适然百年内，与此七尺遇。  
尔从何处来？行将徂何处？扶服径幽谷，途远日又暮。

——《来日二首》之一

痛苦来自人的自身，有生命，就有与生俱来的痛苦。在《欲觅》一诗中，静安明确揭示：“忧与生来讵有端！”人类最大的敌人还是他自己。《老子》所说的“吾所以有大患，为我有身”一语，为静安深所服膺：“大患固在我”、“我身即我敌”（《偶成二首》）。人生不断“自屠”、“自烧”、“自缚”、“自钻”，自己总是跟自己作对，最后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，这是人生无法避免的悲剧。静安曾说过：“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，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、即与痛苦相关系。”<sup>[8]</sup>“欲”，是生活中痛苦的根由。他在诗中不无悲悯地指出：芸芸众生，无不在“冥然逐嗜欲，如蛾赴寒檠”（《端居》之二），明知嗜欲如火般焚身，人们还是趋之不已。物欲，包括饮食之欲与男女之欲，都源于人的“生存意志”，即使有大智慧的“至人”，也不免“中夜博嗜欲”（《偶成》），为物欲所役。在《冯生》一诗中，静安为人生的意志、物欲、痛苦作出生动的图解：

众庶冯生亦足悲，真人何事困餧馁？家贫且贷河侯粟，行苦终思牧女糜。溟海巨鹏将徙日，雪山大道未成时。生平不索长生药，但索丹方可忍饥。

连“真人”也要被饮食之欲所困扰。庄周要向监河侯贷粟，释迦牟尼也因饥饿而接受牧女献奉的乳糜，世界上没有可令人“忍饥”的丹方。而性欲，则为延续物种所需，故为生命意志的最终体现。静安诗中以蚕设喻：“耑耑索其偶，如马遭鞭棰。响濡视遗卵，恬然即泥滓。明年二三月，儘儘长孙子。茫茫千万载，辗转复周始。”（《蚕》）语气极为冷峭。

生活既然是如此苦痛，如此可悲，世人唯有寻求“解脱”之道。静安先是想逃遁眼前的一切，“苦求乐土向尘寰”（《杂感》），他向往着罗浮山下的万树梅花，翁埠潮头的千顷月色，在诗中

多次表达自己归隐山林的愿望：“驰怀敷水条山里”（《杂感》）、“便拟山中构一庐”（《重游狼山寺》），“我与野鸥申后约，不辞旦且冒寒烟”（《晓步》），“闻道南山薇蕨美，膏车径去莫迟疑”（《病中即事》）。但归隐毕竟是无法实现的，诗人只好寄托于读书和艺术之中。读书是静安一生最大的乐趣。十六岁时即“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，购前四史于杭州，是为平生读书之始”<sup>[9]</sup>，以后更得读古今中外的奇书异籍：“百年那厌读奇书”（《重游狼山寺》），“周流观石渠，蔽亏东观籍”（《偶成》），沉浸在读书中，忘掉世间一切的烦恼和痛苦，求得直接之慰藉。艺术创作，更是诗人内心感情的升华，在美的创造中获得“最纯粹之快乐”，静安把写诗作为一种解脱之道：

不有言愁诗句在，闲愁那得暂时消！

——《拏飞》

谁能妄把平成业，换却平生万首诗！

——《坐致》

然而，读书和创作，只不过是暂时的解脱，深受叔本华思想影响的王国维，还想追寻终极的解脱之道：“蝉蜕人间世，兀然入泥洹。”（《偶成二首》之二）泥洹，即“涅槃”，意为“寂灭”，叔本华认为最终的解脱是“进入涅槃”，求得“寂灭中的极乐”。<sup>[10]</sup>对青年时代的静安来说，“涅槃”毕竟是难以接受的，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怀疑论者：

人生过处惟存悔，知识增时只益疑。

——《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》

这一“疑”字，使静安不致于溺而不返，但又增加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：“何为方寸地，矛戟森纵横？闻道既未得，逐物又未能。袞袞百年内，持此欲何成？”（《端居》之二）“相逢梦中人，谁为析余疑？”（《来日二首》之二）静安总是感到“胸中妄念苦难除”（《五月十五夜坐雨赋此》），所以他在诗中一再用杨朱歧路的典故：“未免杨朱泣路歧”（《病中即事》）、“只分杨朱叹歧路”（《天寒》）、“欲求大道况多歧”（《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》），最后，静安甚至连释迦牟尼自己能否真正解脱都感到怀疑了：“人间地狱真无间，死后泥洹枉自豪。终古众生无度日，世尊只合老尘嚣。”（《平生》）他终于放弃哲学的探求，志趣转移到文学的研究上。

除了上述的抒情诗外，值得注意的还有静安早期诗作《咏史二十首》。组诗当作于在东文学社学习时期前后。王氏集中失收，后载于《学衡》杂志，原编者谓其“分咏中国全史，议论新奇而正大”。罗振玉因激赏其中“千秋壮观君知否，黑海东头望大秦”之句而“拔之于俦类之中，为赡养其家，俾得力学”<sup>[11]</sup>。组诗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，对历史人物分别作出评价，可见静安在青年时代对史学已经有浓厚的兴趣。

第二期的诗歌有收入《观堂集林》壬子至乙卯所作的古今体诗23首，加上《观堂别集》辛亥所作“定居京都”诗四首及《题殷虚书契考释》一首，共28首。静安在日本京都曾将壬子、癸卯两年所作之诗编成《壬癸集》，以木活字排印出版。

这时期最重要作品有所谓“壬子三诗”，即长篇七古《颐和园词》、《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》、《蜀道难》三诗。辛亥革命后，静安追随罗振玉流亡日本，怀往感今，对清王朝的灭亡无限痛惜。《颐和园词》以慈禧太后的一生为线索，叙述晚清史事。诗中写慈禧听政初年，任贤使能，国家重见“中兴”，修建颐和园以行乐。五十年间，国事翻覆，中间又经历过扶立光绪帝及庚

子事变等事。慈禧死前以宣统帝入继大统，最后清王朝却被袁世凯所颠覆。诗人在篇末叹息道：“定陵松柏郁青青，应为兴亡一拊膺。却忆年年寒食节，朱侯亲上十三陵。”静安对此诗甚为满意，认为虽或不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，但亦可追步吴伟业《圆圆曲》。然诗中对慈禧多有溢美之辞，亦时露清室遗老的思想，影响了本诗的艺术感染力。

《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》一诗中，静安检讨了清王朝灭亡的缘由，表现了一位史学家应有的识力：“百僚师师学奔走，大官诺诺竞圆转。庙堂已见纲纪弛，城阙还看士风变。食肉偏云马肝美，取鱼坐觉熊蹯贱。观书韩起宁无感，闻乐延陵应所叹。巾车相送城南隅，岁琯甫更市朝换。羸蹶俄然似土崩，梁亡自古称鱼烂。”清代末叶，已是纲纪废弛，官僚无耻，士风堕落，伪学流行。因王朝内部腐败而自取灭亡，静安在哀伤惋叹之余亦感到无奈。

《蜀道难》一诗则专为端方之死而发。端方是一位满族大臣，亦颇好收藏金石文物，为此静安颇有点惺惺相惜。端方在辛亥革命初起时被派往四川讨“贼”，途中为所率领的新军将士所杀。端方其人其事，无论如何都不值得为之大书特书，而静安在诗中却揄扬备至，视其被杀为壮美之悲剧，则未免带有偏见了。

除了“壬子”三诗外，静安在这时期所写的诗歌亦多有政治色彩。如《读史二绝句》悲愤地指斥袁世凯强迫清帝退位并攫取政权：

楚汉龙争元自可，师昭狐媚竟如何？阮生广武原头泪，  
应比回车痛哭多。

不少诗句明确地表示对革命的反对态度：“烈火幸逃将尽劫，神山况有未焚书。”“市朝言论鸡三足，今古兴亡貉一丘。”（《定居

京都……》)“可但先人知汉腊，定谁军府问南冠。”(《壬子岁除即事》)“尽有三山沉北极，可无七圣厄襄城。”(《游仙》)此外，如《咏史》五首，借古讽今，赞美古代英明的帝王而对袁世凯及其追随者深致不满；《昔游》六首，缅怀故国，极写山川之美，慨叹欲归不得。而长篇五古《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》，则敷陈排比，叙述光绪之后隆裕的一生，感怆无限。隆裕先既失欢于光绪，接着又经历戊戌政变与庚子之乱，光绪被幽囚而死后，过继了溥仪作小皇帝，不及三年，辛亥革命发生，又遭到权臣袁世凯的迫胁，清帝逊位，不久，隆裕便抑郁而终。诗篇长达九百言，篇末更对隆裕与溥仪“寡妇孤儿”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哀切和同情：“补天愁石破，逐日恨泉干。心事今逾白，精诚本自丹。”也许是这种“仁者的悲愤”<sup>[12]</sup>，使静安对清王室有着一份亲近的感觉吧。在这时期的诗作中，有一首《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》，诗歌记述日本京都的文人雅士在癸丑上巳日作“兰亭集会”的盛事，当中以大量笔墨考据王羲之《兰亭叙》石本的流传经过，议论汉魏以来各种书体的演变过程，已开了第三期“以议论为诗”的先声。

第三期的诗作有收入《观堂集林》丙辰至癸亥所作的古今体诗 25 首，加上《观堂别集》中丙辰至壬戌所作的古今体诗 22 首，共 47 首。

静安自日本返国，寓居上海，与学者沈曾植过从甚密，专意研读出土文献，对古文字学、古音韵学、西北史地以及敦煌文献、金石典籍均有精深的研究，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，这期间静安的诗往往也带有浓郁的学究味。如长篇七古《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》一诗，可说是叶韵的论文：“商侯治河此胥宇，洒沉澹灾功微禹。王亥嗣作殷高祖，服牛千载德施普。击床何怒逢牧竖，河伯终为上甲辅。中兴大业迈乘杜，三十六叶承天序。”对殷商史和甲骨文不熟悉的读者简直不知所云。此外如《题沈乙庵

方伯所藏赵千里云麓早行图》三首，议论宋元的南北宋画家；《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》分别论述唐代户籍制度、佛经、小说、诗词等；《冬夜读山海经感赋》则专写《山海经》中的横暴之徒如蚩尤、共工、相繇等；还有题柳如是尺牍的二绝句，题汉砖的二绝句，题西泠印社图的二绝句，都少情寡味，大似乾嘉学者以议论为诗之作。

静安这时期的诗作，也受到“同光体之魁杰”沈曾植的影响，如《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章》，为和沈氏之作，风格亦步趋之。其一云：

春心不可拘，秋思更难量。雨蚁仍争垤，风萤倏过墙。  
视天殊漫漫，观化苦微茫。演雅谁能续，吾将起豫章。

钱仲联谓其“简雅有致”<sup>[13]</sup>。“雨蚁”、“风萤”之语，隐含讽意，可见静安仍未忘情于政治。又如：“万里玄黄龙战野，一车寇媾鬼张弧”（《戊午日短至》），“诘朝唱振子，政可殴神奸”（《小除夕……》）等，亦不无愤激。至如《游仙》诗惋伤张勋复辟失败，咏张氏二烈女诗称赞张曾敷杀害秋瑾，则更见作者的思想倾向了。

第四期的诗作包括《观堂集林》癸亥以后的古今体诗 10 首、《观堂别集》癸亥以后的律绝 30 首，共 40 首。其中 35 首是为清废帝溥仪以及王公、大臣、太监、朋友题咏的，还有五首是贺寿诗。这些诗歌或表达对清室忠悃之情，或抒发世事沧桑的哀感，特别在冯玉祥“逼宫”之后，静安的诗歌更充满彻骨的悲凉：“事去死生无上策，智穷江汉有回肠。”（《罗雪堂参事六十寿诗》之一）“琼楼已自归无地，寒谷那知岁有春。”（《袁中舟侍讲五十生日寿诗》）静安似乎对一切都绝望了。

王国维诗歌创作的四个时期，与作者一生经历的四个阶段是

一致的。静安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指出，有“诗人”之诗，有“政治家”之诗，“诗人之眼，则通古今而观之”，“政治家之眼”，则“域于一人一事”。静安又认为有“主观之诗人”、“客观之诗人”，主观之诗人阅世浅，性情真，客观之诗人阅世深，材料变化丰富。可以说，静安在第一期中是位“主观之诗人”，所写的是“诗人”之诗；在第二期中是位“客观之诗人”，所写的是“政治家”之诗。静安青年时醉心于哲学，而又常为感情所困扰。他曾在哲学与诗歌两大领域中彷徨：“余之性质，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，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。”<sup>[14]</sup>其实静安是一位感情与理性都极为丰厚的才人。他想为解脱“人生之问题”而从事于哲学，在研究过程中，又知道哲学既有真理，也有谬误，因而内心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痛苦，发而为诗，自能以最真挚的感情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。静安第一期的诗作，多半是“忧生”之诗。对人生种种问题感到困惑，满怀悲悯之情，力求解脱之道，在作品中表现出一位“理想家”的“赤子之心”。近人论及静安的诗作，每谓其“在形式上更多的却是学古”，“少作不过放翁境界”，则未免是皮相之言。无疑，静安的少作在艺术手法上是受到陆游的影响，而其艺术语言则完全是独创的。如上文所引的“人生过处惟存悔，知识增时只益疑”、“人间地狱真无间，死后泥洹枉自豪”等语，是在古代任何一位诗人的集子中都找不到的。缪钺谓静安诗“其中含有哲学意味，清邃渊永，在近五十年之作家中，能独树一帜”<sup>[16]</sup>，当以这一期的诗歌而言。在第二期中，静安创作了多首长篇古诗及组诗。辛亥革命推倒清王朝，旧的伦理道德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分崩离析，静安彻底放弃他曾深爱的西方哲学和小说、词曲的研究，“反经信古”<sup>[17]</sup>，在异国日本致力于甲骨学的开拓，取得卓越的成就。这时静安已饱历世变，他写的都是“忧世”之诗，是有为而发的，写作动机十分明确：为“兴亡”而拊膺叹息，提倡沂泗

之上的孔子之道，表彰“忠节”，批判篡位夺权者。在作者心目中，这些是客观的、宏壮的“史诗”，他在致铃木虎雄书中谈到《颐和园词》：“此词于觉罗一姓末路之事略具。至于全国民之命运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，尚有更可悲于此者，拟为《东征赋》以发之。”<sup>[18]</sup>可见静安是要作“政治家”之言的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迂执和偏见，使静安无法理解政治的真相，他的诗作自然也无法做到真正的客观。第三期的诗是“学人之诗”。以学问为诗，以经术为诗，以议论为诗，以考据为诗，如此种种，实已背离诗道，这期间除了和沈曾植唱酬的几首诗外，佳作已是不多了。第四期的诗则是典型的“文学侍臣之诗”。应题，应景，应命，既无诗情，复无诗意，光是为溥仪题画的诗就有十四首，善颂善祷，真使人不敢相信这出于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与诗人之手。

王国维一生只留下 190 首诗，作为一位诗人来说，数量不算很多。在近年出版的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·诗词卷》中收录静安诗 47 首，钱仲联编著的《近代诗钞》中收录静安诗 74 首，入选的比例是相当高的。静安创作态度严谨，不苟作，不滥作，其诗歌的成就，以第一、二期为最高，第三期也有一些佳制。在清末民初，诗坛上流行着以“诗界革命”为号召的“新派诗”和以“宋诗运动”为宗旨的“同光体诗”，不少诗人都受到这两大流派的影响，而王国维却能独辟蹊径，以西方文艺理论研究诗歌，并以之来指导诗歌创作，故其第一期的哲理抒情诗和第二期的长篇史诗都能取得较大的成功，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位。

### 三

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，是作者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

传统的基础上，试图将西方某些美学思想融汇到传统的文艺批评中的一部重要著作。《人间词话》中的一些有关艺术特征和创作方法的论述，正是王国维进行词的创作的理论根据。欣赏静安词，应先对《人间词话》有所了解，同样地，要更深刻地研究《人间词话》，也不能不读静安词。

《人间词话》论词的核心是“境界”说：“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、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。”至于“境界”一辞的具体定义，作者并未立说，故后世的注家蜂起，或以“意境”释之，或谓即“作品中的世界”，或认为指作品中“鲜明的艺术形象”，或认为“只要吾人内在之意识中确实有所感受，便亦可得称为境界”。郭绍虞解释说：“盖所谓境界，不仅是指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图景，也包括了作家主观的情感，它是以主客观统一的概念出现的。”<sup>[19]</sup>王氏在他托名樊志厚所作的《人间词·乙稿·序》中说：“文学之事，其内足以据己而外足以感人者，意与境二者而已。上焉者意与境浑，其次或以境胜，或以意胜。苟缺其一，不足以言文学。”这个“意境”说正是“境界”说的前身。“境界”说除了包有“意境”说的内容外，还强调了作家对客观世界的真切感受：“故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，否则谓之无境界也。”王氏把“写真景物、真感情”作为有境界的“最上”的标准，认为只有这样，才能使词“自成高格”。至于如何表现真景物、真感情的问题，王氏又提出“不隔”之说。要求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”。作品情景交融，鲜明生动，能使读者获得真切的感受，则是“不隔”。所谓“隔”，也就是说，作者对客观事物没有真切的感受，或其感受被作品中处理不当的语言形象所阻隔，因而未能很好地传给读者，这样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感染力。

王国维又提出“有我之境”、“无我之境”之说：“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；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

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”所谓有我之境，是指客观景物与主观感情强烈交流时产生的境界。移情于景，融景于情，作品中的情与景互相作用，互相影响，故在客观事物的描写中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。所谓无我之境，是指作者采取“万物静观”的态度，进行“不动心”的描写，以达到“物我相忘”的境界。故王氏接着解说：“无我之境，人惟于静中得之；有我之境，于由动之静时得之。故一优美一宏壮也。”无论“有我”或“无我”之境，其实均有“我”在焉，所以王氏又特别作出解释：“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，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。”

《人间词话》还进一步接触到创作方法问题：“有造境，有写境，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颇难分别。因大诗人所造之境，必合乎自然，所写之境，亦必邻于理想故也。”作者注意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，并认为可把理想与现实统一在创作中，这论点无疑是有它的启发意义的。

王国维力图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贯彻其美学理论，一部《人间词》就是他用以宣示世人的样板。

《人间词·乙稿·序》中说：“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，以其能观也。出于观我者，意余于境；而出于观物者，境多于意。然非物无以见我，而自有我在。故二者常互相错综，能有所偏重，而不能有所偏废也。文学之工不工，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。”又云：“静安之为词，真能以意境胜。”“静安之词，大抵意深于欧（阳修），而境次于秦（观）。”可见王氏颇以其词“有意境”而自矜的。下面是他自己最欣赏的两首词：

昨夜梦中多少恨？细马香车，两两行相近。对面似怜人  
瘦损，众中不惜搴帷问。  
陌上轻雷听隐辚。梦里难从，  
觉后那堪讯？蜡泪窗前堆一寸，人间只有相思分。

——《蝶恋花》